

饶著固庵文录序

钱 仲 联

文集之名，昉自中古，前此无有也。刘略班志，惟列诗赋，著诸家篇数，初无集名。东京而次，文章朋兴，云构风骇，然范陈二史，于文士诸传中，记其文笔，第云著诗、赋、碑、箴、颂、赞、诔、七、吊、连珠、书记、论、奏、令、策若干篇，不云文集若干卷，实斋章氏所以云“文集之实已具，而文集之名犹未立”。“隋志‘别集之名，东京所创。’盖未深考”。曹丕与吴质书称道徐、陈、应、刘，谓“撰其遗文，都为一集”，此殆总集之嚆矢。陈寿于晋初定诸葛亮故事，奏上诸葛氏集，此殆别集之嚆矢。然观亮集目录内涵，诚如太炎章氏所云：“若在往古，则商君书，而隋志亦在别集”。阮孝绪七录，经典、纪传、子兵、文集之四录，已为唐人经、史、子、集之权舆，故实斋以为“集部著录，实昉于萧梁，而古学源流，至此而一变，亦时势为之也。”

所谓古学源流者何也？请循其本。盖在先秦，文哲一体，诸子论道述事之专撰，寻其质，皆别集也。儒、道、墨、法，显学争鸣，自孟、荀、老、庄、墨、韩以迄吕氏，岂徒其学之六通四辟，“皆以其有，为不可加”而已，即其文亦高出于后代，并风格亦各异焉。孟之雄肆，荀之密栗，老之精约，庄之淑诡，墨之素朴，韩之刻深，吕之闳博，是皆专家之作，虽偶有弟子或他人附益者，要无害其为一家之文也。荀书且以美文成相篇、赋篇纳入矣，韩子之内外储，启连珠之先路，此其名为子部，与后世文章

别集奚异焉。此诸葛氏法家之书，所以得谥为集也。至于刘略诗赋，更属实斋所云“成一家之言，与诸子未甚相远”者，厥初未尝哀而称为文集而实即是集，然则所谓“文集之实已具”者，固不待东京而始然。文家别集之名既立，“后世应酬牵率之作，决科俳优之文，亦泛滥横决，而争附别集之名”。“势屡变而屡卑，文愈繁则愈乱。”呜呼唏矣！

盖自昭明以沈思翰藻为文，“以文辞之封域相格”，唐以来变本而加厉，自宣公、昌黎、柳州、宾客诸集外，学与文歧而为二，无论偶体或散文，凡一家为一集者，往往以文为主也。宋儒见理邃密深沉，《晦庵集》选言雅驯，诚文以载道者之雄。《水心集》之言经制者次之。下此者黄茅白苇，治学者文不工，能文者中无实，一命文人，便不足观，别集云者，遂为博学高流所诟病，非无由也。曼珠一代，集部如林，张广雅《輶轩语》称其中有实用胜于古者，特举朱彝尊、方苞、杭世骏、卢文弨、戴震、钱大昕、孙星衍、翁方纲、李兆洛、全祖望、顾广圻、阮元、钱泰吉、武亿、严可均、张澍、洪颐煊、包世臣、曾国藩之书，谓其或可为掌故之资，或可为学术流别之镜，或可考辨群书义例、古刻源流，或可诋正史传之差误。此诚可谓见其荦荦大者。而独以专集属之词章家，则隅见矣。刘略诗赋，固词章也，亦何害其为一家言之近于诸子也。广雅列举朱氏以下诸家之书以别于专集，而其书实皆别集并明标集之名者也。歧学术与文章为二，宜其论之自陷于矛盾而不能中肯綮矣。

若论文质彬彬，融两者于一冶，则在胜国二百数十年中，殆无逾于汪中《述学》之美且善者。《述学》不称集，而实集也。其书既有平章子部之文，为清学开辟蹊径，复有美文，睥睨三唐，世尊为八代高文，独出冠时。斯诚别集之翘楚，上承先秦诸子暨屈赋之脉者。《定庵文集》亦其亚，则揭文集之名矣。晚近王国维《观堂集林》，允称独步，《海日楼文集》、《太炎文录》，亦名世巨帙，斯皆

言其学之精兼文之美者，《寒柳堂文集》，时流所重也。其学淹贯中西，信为弘博，而文差不逮，持较乃翁《散原精舍文集》之雅言，则有间矣。此可知文质并茂之难也。

余今读选堂饶先生固庵文录，乃喟然叹曰：此并世之容甫与观堂也。抑又有进者，容甫生今二百年前，其学固不能不为乾、嘉学风之所囿。观堂生近世，精殷墟甲骨，考古史，通域内外于一杭，融文史哲为一境，世推为现代学派之祭尊与开山，良非虚誉。然观堂之学，究不能谓其为广大教主，无所不包，峻不可攀，河汉无极也。如释藏道籍，即非其所措意矣。沈、章巨子，殚精国故，亦探梵典，而不谙西国之文，则创新遂不能与观堂敌。今选堂先生之文，既有观堂、寒柳融贯欧亚之长，而其精通梵文，亲履天竺，以深究佛学，则非二家之所能及。至于文章尔雅，二家更将敛手。斯录也，都骀体篇、散体篇于一帙，其为赋十三篇，皆不作鲍照以后语，无论唐人。其余颂、赞、铭、序、杂文、译文，皆能以古茂之笔，抒新纪之思。所颂者如法南猎土谷史前洞窟壁画，所赞者如马王堆帛书易经，所序者如殷代贞卜人物通考，所译者如梨俱吠陀无无颂、近东开辟史诗，非寻常笃古之士所能措手也。骀体得此，别开生面。容甫如见，得毋瞠目。至其散体，所考释者，自卜辞、儒经、碑版以迄敦煌写本；所论说者，自格物、奇字、古籍、史乘、方志、文论、词学、笺注、版本旁及篆刻、书法、绘画、乐舞、琴艺、南诏语、蒙古语、波斯语，沉沉夥颐，新解澜翻，兼学术文美文之长，通中华古学与四裔新学之邮。返视观堂、寒柳以上诸家，譬如积薪，后来居上。九州百世以观之，得不谓非东洲鸿儒也哉！

先生不以余不学，以文录序言，诤誨相属。余反复循诵，有如《大智度论》所云：如入宝山，自在取宝。不辞舛陋，敢为引咍。盖将为当代学苑悬此鹄的，并为集部树中天之帜也。先生嘯傲于红香炉顶，俯视海天，鲸波浮涌，百灵狂沸，其将许我拍

肩，迨尔一笑，以为若斯人者，始可与言集部也矣。

辛未季夏，钱仲联序于苏州大学，时年八十有四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苏州大学中文系

编者注：固庵先生，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饶宗颐先生之号。

姚名达《中国目录学史》勘误一则

姚名达先生《中国目录学史》为文献学领域的重要资料书，但存在个别错误，今试予纠正之。其《校讎篇》第191页（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）云：“宝历元年，翰林学士王尧臣等上新修《崇文总目》六十卷，分十九部，有书三万六十九卷。”按：这句话至少有二处错误：1.宋无“宝历”年号，按其成书年，“宝历”乃“庆历”之误。“宝”、“庆”繁体近似，当是排印上的错误；2.“三万六十九卷”当为“三万六百六十九卷”之误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载：“仁宗既新作崇文院，命翰林学士张观等编四库书，仿《开元四部录》为《崇文总目》，书凡三万六百六十九卷。”

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·序》所记亦为三万六百六十九卷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“崇文总目”条沿此说。另外，后世对该书卷帙说法不一，姚公定此书为六十卷，乃从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和《麟台故事》，而《文献通考》称之“六十四卷”；《中兴馆阁书目》、《宋史·艺文志》则作“六十六卷”；江少虞《宋朝事实类苑》更云“六十七卷”，而后世通说多从《宋史艺文志》作“六十六卷”。姚公以为是书分十九部，不知出于何处。是书所本为《开元四部录》，当为四部分类，而其书下小类则分为44类，计经部9类，史部12类，子部20类，集部3类。

· 冯秋季 ·